

【法学研究】

沟通与信任:和谐政治关系形成的机制

武建强

(1.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2.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社会各政治关系的有效和谐。通过分析政治信任和沟通的关系及其对于建构和谐政治关系作用,分析认为: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建立起多渠道、畅通的沟通信道,促进和巩固政治关系主体间的信任机制,进而保证社会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局面的形成。分析结果表明:只有进一步完善政治信任机制和深入拓展政治沟通渠道,才能构建良好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

关键词: 政治学;和谐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信任;政治沟通;政治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4-0072-06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 establishing harmonious political relation

WU Jian-qiang

(1.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society harmony i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ety harmony reflects the harmony of all politica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through analysis for the relation of political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nctions in establishing the harmonious political relation,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multi-channels, unblock channels in the complicated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promote and consolidate trust-mechanism of political individual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only by perfecting political trust and widening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can harmoniously political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politics; harmonious society; political relation;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0 引言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

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1]。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和继承,也是对现实秩序的创新和突破。和谐社会集中体现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和谐,其他所有关系都是受政治关系的支配和制约。政治关系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秩序前提和制度保障。和谐政治关系从其根本性质上讲,是社会成员及其组成的各种团体,

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权力争夺和相应的权利分配,以获得更有利于自我利益实现的合理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公共权力主体合理分配各种价值资源,构建理想政治秩序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各阶级、各集团都有自己的特定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又必须通过“政治国家”这种“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加以解决。由于国家这一强势主体在进行权威性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社会成员及其团体往往会利用各种方法途径来影响政府决策;同时,政府的决策必须考虑到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偏好,才能让各政治主体间实现一致同意,从而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因此,政治关系中各主体之间就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分配而存在的稳固持续的政治信任及主动性的政治性沟通,就成为以理性、宽容、合作为特征的和谐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选择。

1 公权力主体和普通民众之间政治信任是构建和谐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石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就是各政治主体在获取和维护各自利益或代表的利益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政治关系居于中心地位,是各种政治主体自组织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以特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2]。一定的政治关系决定着一定政治主体的政治地位,从而决定着它同其他政治实体的关系,决定着政治资源中重要的因素——权利和权力的社会分配及其组合方式。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分化和组合。这种利益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利益诉求模式亦逐步分化,多元利益的冲突在争夺资源中愈发激烈,这种冲突往往会突破公共利益的限制而走向极端。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当个人利益受自我利益而不是任何公共利益观念的驱动,他们是自身利益的最好法官。当其利益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运作而融合成共同利益时,国家就会发挥作用。因此,当斗争、冲突、谈判、妥协成为转型期社会的突出特征之时,如何妥善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实现多元政治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成为公共权力主体面对的首要难题,而这恰恰是和谐社会的一大要义,即和谐政治关系的实现。和谐的政治关系是指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客体的

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或秩序,而这种规范或秩序双方都认可,因而关系比较缓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框架下,政治关系的和谐、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政治生活空间的拓展、理性政治观念的确立,都是政治系统必须实现的“和谐”内容。物质和谐是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基础;政治和谐是物质和谐、精神和谐的保证;精神和谐是物质和谐、政治和谐的内在动力。为达致和谐共生这一元目的,首先需要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确立信任的心理基础,它能使彼此之间实现对政治规则、政治程序和政治结果的认同,容纳不同利益需求,包容意见和冲突,采取妥协和商议的办法,从而达成政治谅解,实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升华。可以说,政治信任是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是和谐社会最为缺失、最急需的政治心理机制。

在和谐的政治环境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机制包含三大要义。

第一,政治信任是一种动态过程中的信任,并不单纯强调以政府为中心或以民众为中心。双方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在整个系统中通过各自之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彼此的发展。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者和行使者,需要民众和其他社会团体接受其执政理念,认同其制订的规则;而公民和社会团体则需要政府能接纳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意愿和要求,获取有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公共政策。为此,彼此之间就需要互通信息,这种信息的输入输出的传导过程将持续地影响着政治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政治主体既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又充分尊重对方的权利及尊严,是一个动态的链条。

第二,政治信任是以公平正义为平台,双方都遵守这一共同的准则。政府从产生之日起就打着“中立”、“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旗号,并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创制着代表正义的规则,并以此为工具,实现对社会其他主体的约束和限制;而作为原子化形式存在的公民及其集合体,也在公平正义的意识之下从事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彼此交流、交换产品,以确保自我利益和价值的实现。“人是为了社会交往而被创造,但是没有一种正义感,社会交往就无法得到维持,因此人必定带着一种正义感而被创造”^[3]。正是这种正义感的驱使下,构成了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下的市民社会及其活动。因此,对于政府和民众而言,如何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就成为双方能否有效合作的最好平台。

第三,政治信任要求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平衡,也就是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有效平衡。在一个国家共同体中,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矛盾冲突是经常发生的,特别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多元的社会中,因为二者在行使主体、法律地位、运行方式、社会功能乃至目标指向均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双方围绕各自利益和特定目标展开竞争、冲突、对抗。此时,政治权力偏重于任何一方都将导致整体权力结构体系失衡,加速社会灾难的发生。公民权利过分张扬,政府权力畸轻,导致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泛滥;而政府权力过重,则容易导致权力滥用,进而排斥民主、多元,形成极权体制、专制社会。

政治信任是构建和谐政治关系的前提与基础。一个政通人和的政治局势离不开信用品质良好的政府,只有这类政府才能以民众的需要作为其治理的价值诉求,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同时,只有民众认可政府所制定的公共决策不是各种势力讨价还价、追求私利的结果,并能保证社会绝大多数人追求政治平等、经济发展、生活美满的目标,民众才会自觉自愿地拥护政治当局。那么,政府与公众如何实现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呢?多元社会呼唤的是一个民主、健全、流畅的政治沟通机制的建立。

2 加强公权力机构与社会团体、民众的政治沟通是实现政治信任的基本途径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运行环境一直经历着且将继续面对着迅猛多样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是不同政治群体对信息的完全垄断变得更加不切实际。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精英不再能够完全垄断政治信息,普通公众具有了涵盖面更广的知情权,有权了解政治活动的过程与内容。

在现代社会,各级政府官员以及民众都十分关注政治沟通问题,前者更多地把它与执政联系起来,希望通过获得及时有效的政治信息,制定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创造良好的政绩;后者更多地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通过获取真实、及时的信息,了解政府的公共政策制订及其执行情况,从而调整自己的政治参与方式,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中,民众的意愿和政府的承诺以及行为结果之间总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不加强二者之间的

政治交流和沟通,并任由这些差距持续存在、拉大,那么必将导致传统合法性资源丧失,最终破坏政治关系的稳定结构。

和谐社会本身的价值呼唤民主多元的政治沟通机制。和谐是承认差异和一致性的先进理念。社会共同体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异质性,这种特性会随着利益结构的分化组合而愈发突出,因为“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4]。伴随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要求一个既能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又可化解和溶蚀这种矛盾状态的制度设施,它能够用民主妥协的方式缓和冲突,维持共同体自身的稳定。这个设施从实质来看,就是政治沟通。所谓政治沟通,就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对民众发送信息,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对公共舆论的影响”^[5]。政治沟通是不同主体之间有效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包括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沟通等。政治沟通具有双向性、层次性、制度化、多元性、持久性、多向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政治沟通在实现和谐政治生态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实践也证明,建立一个健全、民主、有效的政治沟通机制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科学决策、政府形象及危机管理而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6]138}。

有效的政治沟通对于增强政治主体合法性,调动民众政治参与热情、保证政策法规有效运行以及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沟通是它赖以存在、得以运行的基本前提和不可缺少的要素,它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就像神经之于生命有机体。它通过对政治体系中政治信息的获取、输送、存储、处理和反馈等成为政治体系的重要一环,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也就没有整个政治体系的运动。政治沟通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是政府与民众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其目的是增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度,建立起和谐、民主、共赢的政治关系格局。

3 进一步拓宽政治沟通与信任机制通道,构建起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沟通与信任机制的建构依托的是一个保证各主体充分信任、充分理解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立体式沟通网络,在目前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它的构

建应诉诸以下基本维度和途径。

3.1 培育具有独立意识的多元政治沟通主体

3.1.1 培育称职的政府

作为公共权力的核心单元——各级政府,是政治沟通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应该且必然在政治沟通中扮演积极者的角色。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言行在弘扬公共行政价值和道德示范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政府自身如何认识和改造自身的行为,会直接被民众或其他团体感知,并进一步深化为一种政治心理,它直接与认同相关联,制约着人们如何看待政治共同体、权威和冲突。另一方面,政府的行为决定着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代理人”是否称职。当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受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影响或基于政府、官员自利性出发,往往会造成信息损耗或失真,民众以此判断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公信力差的政府即为不称职的“代理人”。

3.1.2 培育政府之外的第三类组织

善治理论认为,民间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许多民间团体已经成为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民间团体的成员是由一些具有同质性或利益地位相似的主体所构成,它不仅能协调和规范内部利益,还能代表部分群体与公共权力及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博弈,以这类社会组织一方面能及时把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成员。正是在信息的互通交流中,改善了政府形象,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

3.1.3 努力促使非政府性的多元化社会团体生成

这主要包括2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发挥行政化社会团体的作用,如工会、共青团、工商联和妇联等,这类组织过于依赖政府资源,缺乏独立性、志愿性和非政府性,应该充分释放它们利益综合、利益表达、信息反馈的功能,依托其与政府的历史与组织上的密切关系,发挥政治信息沟通中的中介功能。第二,进一步培育民间化的社会团体,如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志愿性的团体。这类团体相对于行政化的社会团体而言,因为在组织上、经济上、人员编制上更少依靠政府,使得它们能比前者保持更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通过自身自觉活动,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监督政府权力运行,制约政府行为失范的发生,从而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化、政策科学化和政治

民主化。

3.2 培育社会共同体必需的理性和妥协的政治主体意识

政治沟通过程中,由人所组成的团体、政府等是政治沟通的关键,它们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均应加强对社会变迁的共识和理解能力,使得公共价值观得以被认同。和谐的政治环境需要一个多元化的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成员对公共价值观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先验存在是保证主体能够主动进行政治信息沟通的前提条件。不论是作为起点的传播者,还是作为终点的受传者,都需要更为理性并懂得妥协意识的人群。

3.2.1 呼唤人的理性和公共理性意识

理性与激进相对应,是政治行为主体在交互作用中如何看待冲突、权利的态度、观念。理性原则反对无原则无限度的沉默和容忍以及狂热地不加判断的采用激烈极端手段。政府、民众、社会团体应能以充分的意识自觉,肯定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与权力,以更加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不同的利益冲突,尤其是政府与民众之间。“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身维护和积极参与”^[7]。现代社会是“公德主导”的时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的日常行为不仅仅是事关自我的利益驱动,更多应该是对他人合法利益和人格的尊重,也就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必须遵循公共生活的规则,享受权利且履行义务,这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理性精神。

价值观多元化加剧了利益追求的“小团体”特征,不同的族群、团体利用“理性团结”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平等,因此,罗尔斯认为“公开利用理性”是公民解决这些困境和冲突的非常恰当的方式。公共理性的基础是“共同的人类理性”,包括了理性的能力和程序,如提出推论、权衡证据以及平衡各种竞争性的考虑,使公民从其他任何人的立场上分析和思考,并进行判断、协商和沟通成为可能,并实现结果的公正性。公共理性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发挥作用,必须摒弃狭隘的小团体意识,用一种理性化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利益需求,此刻政治妥协的产生就成为可能。

3.2.2 培育政治妥协理念的主体意识

妥协是理性精神、宽容意识的逻辑落脚点,是人类解决自身矛盾的理性自觉,“妥协是政治的灵魂”。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大家都能满意的办法是很难实现的。而社会共同体要求缓和冲突, 不致因冲突加剧而导致共同体的解体消亡。“真正的妥协就是综合对立的势力, 并把双方(或几种)观点中的精彩部分以不完整形式保留下来”^{[8] 59}。宽容和妥协有利于冲突的解决, 又能降低社会成本。“政治上成熟的人会寻求折中的解决办法, 使冲突各方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8] 73}。基于现代社会中多元主义的事实, 以及社会不得不有某种方式的统一, 我们必须放弃建立在共同价值上的统一, 而重新寻找一个新的统一基础——通过政治妥协走向“多元一致”。政治妥协一方面将被边缘化或被排斥在外的团体吸纳进协商的过程中, 通过自由表达其利益而释放心理的紧张与不安; 另一方面, 政治妥协也向这些利益团体表明, 妥协的结果来自公正和包容性的程序, 当他们的声音进入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吸纳, 政治妥协也就发挥了它的工具性价值——促进了公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和认同。

3.3 创设科学化、规范化的政治沟通与互信渠道

科学化、制度化的政治沟通与互信机制就是要使政府与政治团体之间、政府与普通民众之、政治团体与民众之间建立一种可预期的规则, 使政治沟通有章可循。

3.3.1 政治性沟通渠道

首先, 建立健全电子型政府的信息沟通网络。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要求信息能快速、流畅进入到决策环节中。政府必须通过计算机及网络, 传递以及反馈各类信息, 使政府组织内各单元相互沟通, 消除障碍, 同时和社会各界建立一个信息沟通的渠道, 实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哈贝马斯说:“技术是改变权力结构的重要杠杆”^[9]。这就迫使政府改变以往以命令为主的“金字塔”型沟通结构, 避免信息的失真、扭曲以致误传, 转向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平板式组织结构, 以适应多元化权威供给的需求; 应打破行政机关的界限, 实现“无缝隙政府”, 把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有关公共数据让多中心主体共享, 避免层层审批、书面审核的运行方式, 实现新的政治沟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距离极大缩短, 相互之间的默契、信任就随之产生, 进而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政治局面。

其次, 进一步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治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和沟通机制。人民代表来自不同的地区、民族、阶层等, 对本

地的情况最为了解, 人大代表贴近民众生活, 了解民意。他们在议案形成过程中会对各类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归纳, 这些信息通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立法和决策机关, 这种“上行沟通”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 同时, 人大代表把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决策等信息及时有效地反馈给公众, 行使“下行沟通”的功能, 不同的政治主体从而获取必要的对称性信息。只有信息的对称, 才能减轻各阶层的心理紧张感, 从而缓和紧张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

最后, 加强人民政协制度和信访制度建设。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要补充形式,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现政治互信、增强政治理解的制度平台。各民主党派都能够在制度的约束下主动献计献策, 参与决策, 并充分发挥他们各自代表一部分利益群体的结构功能, 反映不同的声音和需要, 最后通过政协提案以及党派协商, 把合理的要求纳入到制度的轨道中来。这样一方面能为决策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也能消减冲突, 促进政治关系的稳态发展。信访制度是典型的政治沟通通道, 它承担着政治信息的传递, 这些信息的原动力全部来自民间, 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的转换之后, 部分信息经过分流最终进入决策主体手里。只要政治信息没有完全公开化, 普通民众的信访就会承担起政治信息传递的重要功能。

3.3.2 社会性沟通渠道

社会团体多渠道政治参与机制构建是保证沟通的制度性关键。多形式、多渠道的参与格局, 改变了政治信息输入输出通道单一、过长的弊端, 促进了政府、民众、社会团体三元互动交流的政治局面形成。有效的政治参与能增强民众政治认同感, 公民越是认同政治系统, 就越会积极地关心和参与政治, 支持政府所做出的公共决策。伦斯基认为, “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只有在大多数成员都自由地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目的时, 才有可能完全实现”^[10]。无政治信任的公民一般是将自己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团体参与已经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导形式, 以往作为政府喉舌的咨询机构也应该转换思维, 不仅作为官方的智囊团, 还要为各个政治主体提供必要的信息, 这样才能使自身地位更加独立, 从而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同时, 应该鼓励非政府性的社会团体主动参与政治活动, 将分散的个人意志集中起来, 形成比个体参与大的、多的影响和压力; 多渠道、多角度反映要求, 形成多种声音里的次优公共决策, 并完成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制约。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是实现政治沟通的重要保障。一般而言,媒体对政治议程的影响是一个三边互动的过程,即媒体、公众和权力精英之间的互动。媒体和公众在议程设定中的独立性较强,媒体通过报道引发公众的关注,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引起权力精英的关注,从而设定某个议程;或者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通过媒体报道,形成更加广泛的舆论压力,最后促使决策者进行某项决策。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公众、媒体、政府的三边互动存在不均衡问题,媒体和公众的独立影响议程的能力有限。因此,除了政府应保证媒体身份独立,从传统的行政监管转变为法律制度约束外,媒体自身更应当从简单的解释政策、帮助政府监督落实政策和执行中走出来,把自己作为众多政治力量的一种,充分发挥自己掌握话语权的地位,维护公共正义,努力创设和谐的公共政治空间,履行“第四种权力”的功能,发挥“预置、监督、贯彻、动员、渗透五个方面”^{[6]78}的功能,形成一个制度性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的独立力量,从而真正扮演起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的中介功能,在信息化时代发挥更突出的信息沟通作用。

4 结 语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政治关系的有效和谐。本文通过分析政治信任和沟通的关系及其

对于政治关系和谐形成的作用,发现只有进一步完善政治信任机制和深入拓展政治沟通渠道,才能构建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 杨宏山.当代中国政治关系[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 [3] 肯尼思·W·汤普森.宪法的政治理论[M].张志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 [4] 李景鹏.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1994,14(3):34-37.
 - [5]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 [6] 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7]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 [8] 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9]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步[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10] 戈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M].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1]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M].王靖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 李新春,刘二文,孙婷,等.矿产资源最优开采顺序决策模型研究[J].煤炭科学技术,2006,34(4):44-47.
 - [3]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4] Julian E Orr. Talking about machines: An ethnography of a modern job[M]. New York: IRL Press, 1996.
 - [5] 约翰·布朗,保罗·杜吉德.地区之谜:硅谷的知识能动性[M].李钟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上接第63页)
- [2] 赵传卿.中国矿产资源战略分析[J].中国矿山工程,2006,35(2):23-27.
 - [3] 闫军印,赵国杰.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最优耗竭量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1):56-61.
 - [4] 崔振民,傅群.现代企业两权分立的管理模式对我国矿产资源合理利用的启示[J].中国矿业,2006,15(1):77-82.
 - [5] 成金华.矿产资源规划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 [6] 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桂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